



21 世纪高等院校课程教材

21 SHIJI GAODENG YUANXIAO KECHENG JIAOCAI

西方政治哲学简明读本

XIFANG ZHENGZHI ZHIXUE JIANMING DUBEN

裴德海 编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21 世纪高等院校课程教材

21 SHIJI GAODENG YUANXIAO KECHENG JIAOCAI

西方政治哲学简明读本

XIFANG ZHENGZHI ZHAXUE JIANMING DUBEN

裴德海 编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解正勋

装帧设计：心妍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邮 编：230063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学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 mm×960 mm 1/16

印 张：22

字 数：400 000

版 次：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35.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823297 2846176

序 言

侯惠勤

裴德海教授撰写的《西方政治哲学简明读本》一书即将问世。对此,我十分欣慰。这不仅因为这意味着他的又一次成功转向,还在于这部教材沉潜含玩,厚积薄发,自出机杼,别具眼目,为近年来同类教材中较好的一部。我认为,它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

其一,自觉地站在当代哲学的高度上,对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各种现象和观念作出了深入的反思。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先导。只有自觉地从当代哲学思想的高度出发去解读哲学史,哲学史才可能以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的,这是因为政治哲学从来就是流派纷然杂陈,见解各异,非得经过深入的阅读和批判性的思索,才有可能博采众长,获得自己的出发点和透视点。即使在获得了这样的透视点之后,也要认真处理好“当代的眼光”和“哲学史事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的前结构悬置起来,去追求纯然客观的所谓“哲学史事实”;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把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所批评的“分析目的论”带入到我们的研究活动中,以至于以自己已然接受的政治哲学观念任意地去改造或过度地诠释哲学史上的各种现象和观念。总之,本书在这里很好地把握了这种“适度性”。

其二,紧紧地围绕哲学的基础理论问题,重写西方政治哲学史。众所周知,在以往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着很多误区,其中一个误区是,把哲学理解为单纯的方法论,从而把西方哲学史理解为单纯的方法论的历史。然而,由于这种单纯的方法论崇拜脱离了对哲学基础理论和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已经蜕变为无聊的语言游戏。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之所以把自己于1960年出版的著作命名为《真理与方法》,目的在于强调:重要的是探讨真理,而不是探讨方法。在我国学术界,泛方法论的思维定势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把整个西方哲学的根基——形而上学也片面地理解并解释为一种非此即彼的知性的方法,并使之与辩证法对立起来。其实,在古代西方哲学的语境中,形而上学相当于“第一哲学”;而在近

代西方哲学的语境中,形而上学不但被理解为全部哲学的基础部分,而且其范围也得到了扩大,即包含本体论、理性宇宙学、理性心理学和理性神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把西方哲学的实质理解为形而上学。

该教材的一个根本性的贡献还在于,坚决反对把西方哲学史仅仅理解为方法论史的流行的见解。这部教材为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教学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而在今天大量涌现出来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教材中,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实际上,没有新的研究思路,重写哲学史就始终是一句空话。

其三,密切地关注哲学与科学、哲学与伦理、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的的发展,拓宽了西方政治哲学史的研究领域。不管我们承认与否,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一发展已经整个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也整个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内容和思维方式。海德格尔在1950年出版的《技术的追问》表明了他的哲学思考领域的重大调整,他对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的区分深刻地反映出他对哲学与科学技术关系问题的新思考。稍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1964)、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等著作的出版表明,再也不能撇开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来研究西方哲学史了。然而,在以往的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这些关系虽然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但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也没有给出足够的空间。在这方面,《西方政治哲学简明读本》也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

综上所述,《西方政治哲学简明读本》乃是在实质性地重写西方政治哲学史的努力中跨出的第一步。是为序。

(侯惠勤: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家、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第一章 古代希腊罗马政治哲学.....	1
第一节 古希腊社会状况及其政治哲学的生成.....	1
第二节 七贤与智者的政治哲学	11
第三节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22
第四节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	30
第五节 伊壁鸠鲁与斯多噶的政治哲学	34
第六节 古罗马政治哲学	40
第二章 中世纪西欧政治哲学	51
第一节 社会状况和政治学说概述	51
第二节 奥古斯丁的政治哲学	55
第三节 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哲学	61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政治哲学	70
第一节 马基雅弗利的非道德权力论	70
第二节 布丹的主权论	77
第三节 格老秀斯以法为本的秩序观	80
第四章 17 世纪英国政治哲学	85
第一节 霍布斯的社会正义学说	85
第二节 斯宾诺莎的权利理论	93
第三节 洛克的自由主义学说	98
第四节 休谟的情感主义和价值思想.....	107

第五章 18 世纪法国的政治哲学	114
第一节 伏尔泰的自由平等学说	114
第二节 孟德斯鸠以法为本的自由主义学说	117
第三节 卢梭的平等学说	123
第六章 18 世纪后半期美国政治哲学	138
第一节 杰斐逊的天赋权利学说	138
第二节 潘恩的人民主权思想	145
第三节 汉密尔顿的分权和制衡理论	150
第七章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德国政治哲学	156
第一节 康德的自由学说	156
第二节 费希特的自由和社会学说	168
第三节 黑格尔的国家学说	177
第八章 革命后西欧的政治哲学	194
第一节 边沁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	195
第二节 密尔的群己权界论	198
第三节 斯宾塞的放任主义	214
第四节 格林的政治义务原则和国家干预原则	217
第五节 鲍桑葵的“国家的哲学理论”	224
第六节 自由主义的实质、特征和新动向	227
第九章 20 世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演变	229
第一节 杜威的自由、民主与科学统一观	230
第二节 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自由观	238
第三节 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	249
第十章 20 世纪中期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生成	258
第一节 斯特劳斯的古典政治思想	258

第二节 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思想.....	267
第十一章 20 世纪后期新型政治哲学的诞生	275
第一节 马尔库塞的政治批判理论.....	275
第二节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	287
第十二章 21 世纪转折点上的分配正义哲学	302
第一节 罗尔斯的正义论.....	302
第二节 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	318
第三节 尼尔森的激进平等主义.....	331
主要参考文献.....	339
后 记.....	345

第一章 古代希腊罗马政治哲学

第一节 古希腊社会状况及其政治哲学的生成

一、古希腊社会与城邦概况

我们今天的“政治”概念和许多政治原则起源于古希腊。这些概念和原则自19世纪随着西方国家的扩张而广布于世界各地。但是,在3000年前,西方式的政治概念仅仅产生并存在于地中海之一隅——古希腊。这种“政治”在当时的世界潮流中只能算是一个特例,希腊城邦与周边的疆域性国家相比,脆弱而充满生机。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说明,何以当时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向着疆域性的帝国发展的时候,而希腊竟然出现了公民政治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西方独特的政治学说。我们只知道,从公元前9世纪起到公元前7世纪,在希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形态和政治概念。它的产生并非偶然,但也令人吃惊,因为城邦制度是如此逆时,它在一个以量取胜的世界中,试图维持高品质的政治。后来,黑格尔在他的《美学》当中谈到希腊,指出:“像享受希腊的那种自由的一个国家是和全体公民处于统一体的,全体公民把一切公众事务中的最高活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一个国家只能是又小又弱的,有时由于内部原因而遭覆灭,有时由于外部原因在世界史的进程中被消灭掉。”尽管如同黑格尔所说,这些城邦国家注定要被那些世故的疆域国家所征服,但幸运的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地小人疏的城邦击败了东方的波斯帝国,希腊民族兴盛了几个世纪。这几个世纪被称作古典希腊,这是人类曾经达到的最辉煌的时代之一。政治理论正是在这时产生的。后来希腊的衰弱,反而促使古典文化向世界各地传播,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和罗马人对此贡献甚大。

如果没有古希腊,今天的政治定然会是另外一种模样。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温床是希腊城邦制度。古希腊政治思想因城邦的诞生而兴起,因城邦的兴盛

与繁荣而达到巅峰,因城邦的危机和没落而衰微。因此,在谈古希腊政治思想之前,必得先谈一谈古希腊城邦。

1. 前城邦时代的遗产

城邦大约形成于公元前 9 世纪,定型于前 6 世纪。进入城邦时代的希腊民族,在这块土地上至少已生活了 1000 多年。因此,此时的希腊民族,并非刚刚走出原始的氏族部落社会,相反,它早已进入了文明社会——政治国家对希腊民族而言,并非是初次遭遇的。大约在公元前 2200 年,印欧民族的一支南下到达南欧,其中的一部分进入今天的希腊地区,这就是后来说希腊语的那个民族,另一部分进入了意大利。当时,在希腊地区已存在着米诺斯文明,它的中心是克里特。这支侵入希腊地区的说希腊语的民族虽然已有自己的社会制度,但其文明程度与克里特相比,是远远不如的。抵达希腊后,希腊人模仿克里特人建立起了一种与后来的城邦制度全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王宫制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迈锡尼王国。这些王国以武力维持安全与稳定。国王叫 wanax,军事长官叫 lawage-tas,他们住在坚固的城堡中。在各地有国王派出的总督。地方上的当地贵族,叫巴西琉斯(basileus)。国王靠武力和坚固的城堡来维持其对各地的统治。

在公元前 1450—前 1400 年,迈锡尼王国占领了克里特,毁灭了米诺斯文明。公元前 12 世纪,又一支希腊部落多利安人南下,摧毁了迈锡尼王国。

迈锡尼王国覆灭后,在希腊地区没有出现类似的王国。在公元前 12—前 9 世纪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后人所知甚少。原因是迈锡尼时代的线型文字随着迈锡尼王国的灭亡而失传。这样,从公元前 12 世纪到重新以腓尼基文字来记载希腊语言的公元前 9 世纪之间的三四百年中,没有任何文字的记载。没有文字并不意味着这三四百年真如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所说的是一个“黑暗而沉闷”的时代,相反,这是一个充满了歌唱的时代。希腊人的传统是靠吟唱诗人的弹唱来传承的,大量的史诗正产生于这个时代。有的民族依赖文字记载、成文教义来保存自己的传统,有的民族则更多地以公开的仪式与传唱的诗篇来延续自己的传统,其间的差异导致了政治权力的结构方式和对政治的理解的重要区别。

公开的仪式与民间口传的神话故事,使得一个垄断政治权力的阶层的出现非常困难。在早期民族那里,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宗教。仪式、言语或文字都是被看作与神相沟通的媒介,政治权力是从这种交往媒介当中产生的。如果垄断与神交往的媒介,就是垄断神意的解释权,也就在事实上垄断了权力。文字,往往为书吏或史官所控制;秘密仪式与秘密教义,往往为僧侣所控制。这两种形式容易产生世俗的专制王权的国家或僧侣的教权国家。但是,希腊的关于神的故

事不仅保存在神庙与王宫之中,而且流传于民间,从而使神圣仪式与神话具有公共性的特点,正是这个特点导致了城邦政治的产生。这种城邦政治的核心不在庙堂,而在广场。

2. 城邦的产生、改革与存在的问题

从王宫制度的覆灭到城邦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传统是在各种机遇和无意识的变化之中展示其力量的,而城邦体制的建立,也是在不断的冲突与变革中完成的。作为希腊最典型的城邦之一,雅典的城邦体制的确立,至少经过了传说中的忒修斯立国、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里克利改革等几个阶段。

(1) 忒修斯建立雅典

忒修斯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出生于王政时代。忒修斯当政后,打算把阿提卡的居民集中到一个城镇,使他们成为同一个城市中的统一的人民。因为原先他们分散居住时,很难聚到一块,处理共同事务。忒修斯采取了劝说的方法,对地方贵族们许诺他将建立一个没有君主的政府,也就是他将放弃王权。他的建议被人们接受。于是,忒修斯取消了各个城镇的地方政府、议事会和行政机构,在雅典建立了统一的政府和议事会,规定了全雅典统一的节日。忒修斯把公民权既授予原有居民,又授予外来移民。同时,忒修斯把市民分为三个等级: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从后来的每一次改革,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希腊城邦,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公民权的范围。

(2) 梭伦改革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对梭伦改革有比较详尽的记载和分析。这场改革的背景是旧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的人口对公民权的要求,日益增多的无权者要求获得公民权。这些增长的人口有平民、贵族乃至王侯之家的剩余人口和外来移民。由于公民总量在希腊的城邦政治传统中,一般被规定为一个基本不变的数量,因此新增人口无法获得公民权。

公民权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因为只有拥有土地,才可能得到公民身份。海外殖民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没有办法根本解决新增人口的土地问题。因此,重新分配土地成为解决公民权问题的关键。

梭伦时任执政官,决心变法革新。他首先颁布了解负令,禁止将雅典人变卖为奴隶;其次,他规定一个人占有土地的最大限度,限制贵族多占土地,并将多余的土地分给无权者。梭伦以此确立起普通平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保障他们的土地不会因富豪的巧取豪夺而丧失。最后,梭伦把全体公民分为四个等级,每个等级的权利与其财产(意味着对国家所应做的贡献)相对应。这四个等级分别为五

百斗级、骑士级、双牛级和佣工级。

梭伦还改革了原有的政治体制,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他把第四等级纳入公民大会,使之有投票、发言和选举之权。新设四百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关。剥夺原贵族会议的一部分权利。首创公民陪审法庭,夺取由贵族会议掌握的司法权,所有公民都有权被选为法庭的陪审员。

梭伦改革大大扩大了雅典公民的范围,使国家拥有更广泛的合法基础。他通过革新体制,使利益与权利的冲突得到最大限度的消解。梭伦确立起公民的个体所有权,通过法律维护私人所有制,以保障普通平民的财产和政治权利不因强势集团的非法剥夺而丧失。

梭伦改革为雅典政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他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贯彻,且法律本身还不十分健全。梭伦改革后,雅典党争依然激烈,其追随者庇西斯特拉图以武力夺取政权,实行僭政,强制推行梭伦法律。

(3)克利斯提尼改革

公元前 509 年,克利斯提尼当政,在原有梭伦法律的基础上建立新法。他打破原来的氏族划分,完全按现有居民的居住地来划分居民,削弱原有的贵族势力。按居住地登记公民,使那些游离于氏族之外的雅典人、外邦人及被释放的奴隶拥有了公民权,进一步扩大了公民范围。克利斯提尼改变原来的四百人议事会,设立五百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关。他还首创陶片放逐法制度,在每年春季的公民大会上,用投票的方式决定应当放逐的对国家可能造成危害的公民,以防范僭政的出现。克利斯提尼另建立十将军委员会,由每个部落选举一个将军,组成委员会,统率全军。克利斯提尼改革使雅典政制基本成型。

(4)伯里克利时代的问题

伯里克利时代被公认为雅典的黄金时代。伯里克利(约公元前 493 年—前 429 年)于公元前 443 年至前 429 年连续 15 年当选为雅典将军,握有实权。在他当政期间,雅典的政治、艺术和学术达到了顶峰。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以伯里克利的名义发表的《在葬礼上的演说》被公认为雅典民主政治的经典阐述。

伯里克利最重要的改革是使公民大会成为城邦政治结构中的核心。由于他的努力,公民大会不仅具有立法权,而且具有内政与外交、战争与议和的决策权。陪审法庭的权力也增强了,不仅可以审判,而且可以立法。伯里克利还实行了公务的津贴制度,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可以得到维持一天生活的津贴。

平民权力的过于膨胀,是导致雅典衰落的原因之一。在雅典,津贴制度产生了一批以开会和表决为生的政治寄生虫;一味强调人民权利,导致了操纵和煽动

民意的民众领袖的出现;忽视对民众的教育使得这种建立在“人民”名义上的民主政治远离了政治正义。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把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中所表达的民主政治理念与雅典的政治现实对比,雅典民主政体的内在困境触目惊心般地呈现出来。

3. 城邦的本质

在古希腊语中,“城邦”是“政治”(pólitēs)一词的词根。所谓“政治”,就是城邦的公共事务。在古希腊人那里,它不仅意味着对公共事务的行政管理与技术安排,尤其意味着公民对城邦公共事务共同决定的活动过程。共和时代的罗马人也继承了希腊的“政治”,他们用“公民的”(civilis)一词来表达政治的本质。希腊罗马政治,可以说都是一种“公民政治”。

所谓“政治”,就是共同体成员(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对话并达成同意的活动过程,以及实现此过程的仪式、程序和技艺。在希腊人看来,政治是一门艺术,其意为政治不仅仅以做出决定为满足,他们所热衷的是做出决定的仪式、程序等活动的过程,是讨论、辩驳等现实活动。政治,不仅是一种取得实效的行为,也是希腊公民的生活方式。

政治是共同体成员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决定,对希腊人来说,这似乎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共同体成员的范围。这里所说的“范围”,不是指共同体所控制的疆域范围,而是指怎样的人可以进入共同体,成为其中的权利拥有者,即成为公民。因此,这里的范围是指对公民的界定。对公民的界定,在希腊人看来就是对“人”的界定。在古希腊,一般的抽象的“人”的概念尚未普遍化。同时,古希腊人也没有像今天那样把所有在生物学意义上的“人”都当然地看作社会的“人”。在他们看来,人是具有特质的存在者,这种特质就是德性,因此,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依据于人的德性。只有城邦公民,才被看作是“人”;只有拥有德性的,才被看作是人,才是公民。因此,在政治哲学家那里,政治的核心问题自然而然地会转变成为对人的德性问题的探讨,以及对存在的探讨,因为人是在整个存在中被规定的。

回顾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希腊世界,落入我们视野的是林立的城邦。在狭窄的地域内,集中了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城邦,大者不过数万公民(如雅典,其领土面积约在1000平方英里,公民最多的时候,如在伯里克利时代,为3.5万至4万之间),小的不过万余人。这个现象令我们感到吃惊。为什么这些城邦无法统一起来,甚至在整个希腊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依然顽固地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希腊人似乎从未想到要将所有城邦纳入到一个政治实体。原因大概与希腊

的地理地势特征——丘陵地形,多山,交通不便有关。但这种关系不是根本性的,希腊人既可跨越地中海到埃及,何以不能克服陆地上的种种险隘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必须对希腊城邦的本质有所了解。希腊城邦是建立在宗教仪式和神话之上的。每一个城邦都有其独特的仪式和崇拜的庇护神,有自己独特的神话叙事。城邦是一个公民与神的共同世界,仪式和神话开启了城邦世界。城邦的神是在仪式和神话中现身的,公民通过仪式和神话,将自己与神构建为自足的城邦世界,而与其他城邦相隔离。

城邦既然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它的扩张与分裂,当然不是取决于外在的因素。除非某两个城邦出现了神话和仪式的融合,它们的结合才是可能的。希腊神话的多神性质,在现实中表现为城邦的多元性和绝对自足性。因此,城邦固然是一政治实体,但它与近代的民族国家却不同。城邦占据一定的地域,但地域对城邦而言,实属非决定性因素。城邦必然拥有公民,但并非在某一限定的地域中的人的集合就是城邦。城邦是由行共同祭仪和说同一个神话的人所组成。城邦更像一个教团。城邦共同体,不仅处于同一地域内,在利益上有共同性,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在宗教信仰上具有一致性。

仪式和神话是本原的城邦活动内容。前者衍化为现实的政治和法,后者成为政治理论活动的源头。

仪式乃是最初的公共事务,是政治的原初形态。城邦的一切政治活动,都有仪式性的特点,它不同于仅仅为达到某个现实目标的政治活动,它是一种表达,它的现实功用就是在仪式过程中完成对公民的教化。例如,城邦的民主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理性的仪式,合格公民是在民主过程中造就的。这就是民主的最大目的:不是在公民都合格以后才实现民主,相反,民主是塑造合格公民的最好的方式。

古希腊人的世界结构是由尘世和神圣而神秘的超验力量(神及命运)构成的。这种超验力量不仅是世界的核心,而且是政治世界(即人类世界)的核心,是当时人类共同体得以聚合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为神话诗人的“观照”所揭示。观照是连接神与人的桥梁。因此,诗人在城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独立于世俗权力之外,是世俗的批判者,是真理的揭示者。政治理论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在世俗政治中保持独立地位和具有批判精神的群体,根源于这种诗人传统,理论家是诗人的后来的形式。

由此,希腊的现实政治史,既包括一般的政治活动,也包括政治的理论活动。后者往往更重要,因为政治的理论活动赋予了现实政治以意义。

希腊传下来的政治概念在今天为人们习以为常。但在 3000 年前,这种政治

的产生实属偶然。当时,东亚、北非与中东早已出现了不少统一的大帝国,这些帝国已经显示出其效率和力量。力是当时唯一的民族与民族交往的语言,是决定一个民族生存还是灭亡的决定性因素。大帝国的出现,正适应了这个情况。只有希腊民族面对东方的庞大帝国,坚信自己的城邦才是唯一的“政治”形式。这种坚信在当时固然可说是不合潮流,但为人类政治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4. 自由:公民与奴隶

古希腊是一个奴隶制社会,它的基础就是自由人与奴隶的二元区分。在希腊人看来,自由人之间的关系,即公民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关系;而奴隶被视为物,是在政治之外的。因此,希腊政治理论很少谈及奴隶问题。自由是希腊文化对“人”的最基本的界定,是对公民的界定。自由状态的对立面是奴役状态,公民(或人)的对立面是奴隶。自由的对立面不是纪律,纪律恰恰是自由的特征,在奴役下无纪律可言,因为奴隶没有自由。

不自由的状态有两种:一是人直接地与物打交道,没有任何精神与社会交往作中介。这种状态表现为纯粹的体力劳动。一是人被暴力所强制,在被强制者与强制者之间,无精神与交往为中介,而仅仅是直截了当的暴力。这两种状态在本质上相同,前者可被视为对物施以暴力,后者是把人作为物。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无言的、非精神性的特征。

在希腊人看来,言说以及在言说中体现出来的人的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也是希腊人区别于野蛮人的本质特征。“人”的交往,以言而不以力。政治是自由人的活动,它的本质在于以言作为本质的活动方式,而不是暴力。言说的方式在城邦政治中体现为广场上的演说、法庭中的辩论、会饮时的明智的对话、投票、竞技和悲剧竞赛等这样一些以公共规则为规范的竞说、竞赛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体现了他的自由。政治就是让人展现其自由本质的领域。

奴役状态,就是非自由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无法展示其自由的本质,这是一种强制状态,是一种非政治状态。奴隶制度是希腊社会为后人所诟病的主要问题。在一个希腊城邦中,奴隶、侨民与公民及其家室这三类人,大约各占三分之一,有公民权的成年男子,大约只占六分之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同奴隶制,这使他们在后人的眼里因此而略为失色。用今天的观念责难古人当然没有意义,对希腊的奴隶制应该有更深的理解。

奴隶与公民的本质差别,在于自由与否;而自由与否的关键则在于政治权利,而不在于生存或致富。奴隶可以拥有财产,甚至可以相当富裕。在古典时代,相当多的持奴隶身份的人在财产的数量上已超过许多公民。奴隶无公民权,也就是没有权利参与城邦的公共祭祀活动,没有权利参与其他的政治活动。

因此,说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只反映了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是不准确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与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公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公民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奴隶的劳动为生。事实上,在许多城邦(如雅典),大多数公民是自由农,其他或是商人,或是工匠。据说苏格拉底就是一个雕刻匠。相反,由于经商活动大多由奴隶或外来的侨民从事着,因此,他们的富裕程度往往超过公民。

公民的闲暇来源于他们对自由的热爱,而不是因为他们在物质上已经无限丰富了。他们在早晨去健身房锻炼,上午在街头辩论,晚上又有会饮。这种生活似乎是极悠闲的。希腊人认为,只有在闲暇中,人才能展示其自由:参与城邦宗教仪式;从事政治活动;参加竞技;进行学习与辩论。但是,公民的闲暇是靠异常简朴的生活换来的。他们往往终年披着一件袍子,赤着脚,吃极少量的食物。公民与奴隶的区分,决不在于财产的多寡。耽于物欲,恰是一种奴隶状态。因此,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自由人以茅屋为居室,奴隶在大理石和黄金屋顶下面栖身。

二、古希腊政治哲学的特征

虽然古希腊是西方政治理论的发源地,但是,古典时代的“理论”与今天的政治“理论”毕竟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不注意其间的差异,必然会造成对古希腊的误读,这是我们在研读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时,尤需注意的。了解它们的差异,对反思近代以来政治哲学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以下我们将对古希腊政治哲学的一些主要特点予以说明。

1. “理论”传统

谈及古希腊政治理论时,需注意“理论”一词在当时所具有的特殊含义。在古希腊,理论与实践各指一个现实的活动领域。理论是人沟通于神的本质活动,实践只是指人在公共领域中的活动,即城邦政治活动。两者的关系是,实践依据理论。或者说,理论是一种更高的实践,是城邦政治实践的基础。

理论与实践或沉思与行动的关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两个侧面。古希腊的政治理论活动,本身就是政治现实的基础部分,也是政治现实的核心。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是在理论家的解释中出现的,没有理论家,合理的政治是不可能的。这样理解的“理论”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1) 理论家是真理之揭示者

理论家源于希腊早期时代的诗人、先知,后者被认为是神意的观照者。希腊人认为,任何行为必有神意作依据。在从神话语言向理性语言过渡后,诗为逻辑

语言所取代,诗人成为哲学家。但是,在将行为的合理性建立在对超越存在(无论是神,还是理念)的观照与遵从这一点上,诗人与理论家并无不同。必须注意的是,政治理论家在古希腊绝不服务于某一个具体的政治家,他们独立于世俗权力之外。政治理论在根本上不是对政治现实的单纯的描述,更不是出谋划策。

诗人或理论家在世俗权力之外建立起另一个现实政治领域,他们是世俗政治的批判者,也是世俗政治的立法者和解释者。这个理论的领域构成了对世俗政治的限制,前者不仅在后者的旁边,而且构成后者的根基。政治之所以成为政治,因为有了理论家的解释活动。这一特点决定了政治的理论活动在西方政治史中,不仅不依附于直接的政治行为,而且成为政治史的核心。

(2)政治理论的本质在于批判

批判只是理论的批判。在古希腊,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乃是预定的前提。早期自然哲学家最早奠定了这一传统,为后来树立了榜样,即对传统权威提出挑战。挑战根源于对话态度,对话就意味着承认差异,承认差异就是承认批判的必要性。对话的精神是希腊政治思想得以发展的基础。

这种批判精神首先体现在自我批判。从泰勒斯的“水”,到阿那克西曼德的“阿派朗”,到阿那克西美尼的“气”;从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火”,到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到柏拉图的“理念”,再到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每一个学生都对他的老师进行了批判性的发展,从不曾有过固守家法的观念。在仅仅二三百年时间中,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达到登峰造极、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只能归因于这种理论的批判精神。这是人类精神史上辉煌的一页。

理论精神的核心是“言行和谐”。在古希腊,理论之所以被理解为最高的实践,原因在于,希腊人认为,理论直接地导致行为的发生。“贵族”精神的实质,讲到底就是根据所认识的真理而行动。贵族传统的最高德行——勇敢,就是勇于实践真理,不计后果。

2. 政治理性主义

古希腊政治思想是理性主义的。这种理性主义与近代不同,可直接地把它表述为政治理性主义或城邦理性主义。它不是一种技术理性,而是在城邦中公民如何正当交往的理性。政治理性主义的核心是把讨论看作政治的本质方式,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的,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讨论来达成一致与同意,威压与暴力都不可能导致合理的政治。

哲学就是这种城邦理性主义的产物,因为有讨论就要有讨论的规范和根据。哲学为讨论的共同基础以及讨论所要共同遵守的规范。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也确实是城邦政治活动重要的一部分,是城邦政治顺利展开的保障。逻辑是政治